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 元代史学思想研究

周少川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 元代史学思想研究

周少川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代史学思想研究/周少川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0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ISBN 7-80149-589-6

I . 元… II . 周… III . 史学 - 思想 - 研究 - 中国 - 元代 IV . K09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8496 号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 元代史学思想研究



著 者: 周少川

责任编辑: 张 彤

责任校对: 周一鸣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1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北京隆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8.75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586-6/K·078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学术评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戴 逸

副主任委员 齐世荣 金冲及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小南 王思治 刘桂生 刘家和

阮芳纪(常务) 陈铁健 张振鹍

张椿年 经君健 郭松义 阎步克

谢曙光

##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任 沈志华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一川 于沛牛军王小甫

李凭 李世安 李丹慧 杨群

陈东林 范广伟 黄燕生

##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改版弁言

从 1998 年起，文库改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设立文库的初衷，“出版前言”都讲了，这是历史记录，改版后仍保留，同时这也表明改版并不改变初衷，而且要不断改进，做得更好。

1994 年，面对学术著作出书难，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毅然支持，文库得以顺利面世，迄 1997 年，已出版专著 25 部。1998 年，当资助文库的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面临调息困难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又慨然接过接力棒，并于当年又出了改版后专著 7 部。5 年草创，文库在史学园地立了起来，应征书稿逐年增多，质量总体在提高，读者面日益扩大，听到了肯定的声音，这些得来不易，是要诚挚感谢大家的；而需要格外关注的是，我们的工作还有许多缺点、不足和遗憾，必须认真不断加以改进。

如何改进？把这几年想的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全力以赴出精品。

文库创立伊始就定下，资助出版的专著，无例外要由专家推荐、经编委初审、评委终审并无记名投票通过，从制度上保证选优原则；评委们对专家推荐的书稿，是既充分尊重又认真评选，主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前后两家出版社也都希望出的是

## 2 元代史学思想研究

---

一套好书。这些证明，从主观上大家都要求出精品。从客观来说，有限的资助只能用在刀刃上；而读者对文库的要求更是不断在提高，这些也要求非出精品不可。总之，只有出精品才能永葆文库的活力。

出精品，作者提供好书稿是基础。如“出版前言”所指出的，开辟研究的新领域、采用科学的研究新方法、提出新的学术见解，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达到或基本达到这些条件的，都是好书。当然，取法乎上，希望“上不封顶”；自然，也要合格有“底”，初步设想相当于经过进一步研究、修改的优秀博士论文的水平，是合格的“底”。有了好书稿、合格的书稿，还需推荐专家和评委的慧眼，推荐和评审都要出以推进学术的公心，以公平竞争为准则。最后，还要精心做好编辑、校对、设计、印装等每一道工序，不然也会功亏一篑。

5周岁，在文库成长路上，还只是起步阶段，前面的路还长，需要的是有足够耐力的远行者。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编辑委员会

1998年9月

#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

## 出版前言

在当前改革大潮中，我国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生活有较大提高，思想观念随之逐步改变，全国热气腾腾，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举国公认，世界瞩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而尚待完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那就是在社会各个角落弥漫着“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至；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的浊流。出版界也难遗世而独立，不受影响，突出表现为迎合市民心理的读物汗牛充栋，而高品位的学术著作，由于印数少，赔本多，则寥若晨星。尚无一定知名度的中青年学者，往往求出书而无门，感受尤深。这种情况虽然不会永远如此，已使莘莘学子扼腕叹息。

历史科学的责任，是研究过去，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指导现实。我国历来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数千年者，与此关系匪浅。中国是东方大国，探索东方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能更加直接为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借鉴。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历史学科十分关心，但限于财力尚未充裕，资助项目难于面面俱到。我们是一群有志于东方史研究的中青年学人，有鉴于此，几年前自筹资金设立了一个民间研究机构，现为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创业伊始，主要是切磋研究。但感到自己研究能力毕竟有限，于是决定利用自筹资金

## 2 元代史学思想研究

---

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有关东方历史的优秀研究成果出版。凡入选的著作，均以《东方历史学术文库》作为丛书的总名。

我们这一举措，得到了老一辈史学家的鼓励，中青年同行的关注。胡绳同志为基金题词，在京的多位著名史学专家慨然应邀组成学术评审委员会，复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允承出版；全国不少中青年学者纷纷应征，投赐稿件。来稿不乏佳作——或是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或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同类著作；或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提出了新的学术见解，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百花齐放，绚丽多彩。这些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也增强了我们办好此事的信心。

资助出版每年评选一次。凡提出申请的著作，首先需专家书面推荐，再经编辑委员会初审筛选，最后由学术评审委员会评审论证，投票通过。但由于基金为数有限，目前每年仅能资助若干种著作的出版，致使有些佳著不能入选，这是一大遗憾，也是我们歉疚的。

大厦之成，非一木能擎。史学的繁荣，出版的困难，远非我们这点绵薄之力能解决其万一。我们此举，意在抛砖引玉，期望得到海内外企业界，或给予我们财务支持，使我们得以扩大资助的数量；或另创学术著作基金，为共同繁荣历史学而努力。

《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编辑委员会

1994年9月

## 引　　言

元朝，是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阶段，又是我国民族第二次大组合时期，它在“北迄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sup>①</sup> 的辽阔领域，形成了一个空前规模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当蒙古统治者由漠北草原向四处发展时，他们还处于奴隶制阶段，在征服欧亚大陆的过程中，他们接受了中原汉文化以及东欧拜占廷文化、西亚阿拉伯文化等先进文化的影响，推动了本身文明的进步。以忽必烈为代表的统治集团，顺应了历史潮流，对内行中原汉法，对外开放交流，促进了元代文化的繁荣。陈垣先生在《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的结论中，曾单列《总论元文化》一节，对元代文化的成就进行总结。他说：“盖辽金宋偏安后，南北隔绝者三百年，至元而门户洞开，西北拓地数万里，色目人杂居汉地无禁，所有中国之声明文物，一旦尽发无遗。”<sup>②</sup> 充分肯定了元代文化的成就。

在开放、多元的文化背景下，元代史学继承了前代的优良传统，伴随着时代发展的进程，在诸多方面有长足的进步。

---

① 《元史·地理志》。

② 《励耘书屋丛刻》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1982年影印本。

首先，表现在国史与正史编撰中多民族历史的内容非常丰富。元代史学肇始于蒙古时期用畏兀儿体蒙文写成的国史“脱必赤颜”，这种国史今已散佚，但明洪武年间的汉译《元朝秘史》12卷保存了它的许多重要材料。秘史记载了蒙古各氏族部落的源流，成吉思汗的祖先谱系及其生平事迹，窝阔台统治前期的活动，反映了13世纪中叶前蒙古族的历史进程以及与此相关的北方民族关系的变化，是研究蒙古国建立前后的政治军事制度、经济生产、部落战争、社会组织的重要史料。它以描写战争为长，叙事中又配以诗歌，因而其史学和文学价值都很高，是一部不朽的蒙古史著作。《元朝秘史》已有十余种外国语言的译本，对此书的研究已发展为国际性课题，形成了独特的“秘史学”。此外，译自蒙文国史的还有《圣武亲征录》，此书译成于元世祖中统年间，篇幅较小。它记载了成吉思汗、窝阔台汗事迹，其内容为《元史》太祖、太宗纪所本。史家认为此书也源自“脱必赤颜”，但书中史实与《元朝秘史》稍有差异。元代继承唐宋史官制度，设立史馆和专职的史官，据《元史·百官志》记载，元翰林国史院史官有学士、修撰、编修、检阅等职，负责各朝实录的编修工作。钱大昕的《补元史艺文志》著录了元朝所修实录，包括《五朝实录》（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宪宗）、《世祖实录》、《顺宗实录》、《成宗实录》、《武宗实录》、《仁宗实录》、《英宗实录》、《泰定实录》、《明宗实录》、《文宗实录》、《宁宗实录》等13朝15帝的实录，共500余卷。其中除顺帝一朝36年无实录外，其他各朝都较完整，这些国史材料记录了元朝

的重要史实，虽然今已亡佚，但却为明朝时编写的《元史》提供了基本依据。元代除了有汉文实录外，蒙文国史也还在不断地修订和增补。《元史·虞集传》记虞集主修《经世大典》，“请以国书《脱卜赤颜》增修太祖以来事迹，承旨塔失海牙曰：‘《脱卜赤颜》非可令外人传者。’遂皆已”。可见当时翰林国史院的蒙古、色目史臣还在为“脱必赤颜”一类的国史撰写和补充新材料。

除了国史和相关史料外，元代还很重视对前代史的编修。灭金灭宋时，元朝君臣就注意到对辽、金、宋三史的撰写，搜罗了相关史料，安排了修史人才。由于三朝何为正统的争论和延搁，直到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三月，三史才正式设局开修，五年十月三史相继修成。其中《辽史》116卷，《金史》135卷，《宋史》496卷。三史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撰成，是由于在此设局修书之前，各史已具备了相当的基础。比如《辽史》在金朝和元初已有5次编修的过程，积累的材料丰富而系统，因而最快完成。《金史》则有保存较好的金实录和王鹗的《金史》为蓝本，而《宋史》则以宋十六朝大量的国史为基本材料，再加其他史书删削而成。三史在两年内迅速成书，毕竟过于仓促，或失于阙略，或失于芜杂，难免为后世所讥，但三史的修撰又各有所长。例如，《金史》向来被认为是“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sup>①</sup>，在三史中最为完善。《辽史》内容虽较为简略，但因记辽代史事的其他史籍甚少，故有较高史料价值。至于《宋史》，史家虽病其繁芜，但从

<sup>①</sup>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金史》提要。

另一方面看，正因其卷帙庞大，才能保存大量的史料，提供文献证实的多种功能。总的来说，辽金宋三史的编修是元代史学不断发展的一件大事，三史的完成不仅保持了历代正史编修的连续性，而且与当时的国史、实录等著述一起反映了元代史学民族内容的丰富。

其次，典志体史书编撰的繁荣是元代史学进步的表现。马端临在至元年间撰成的《文献通考》348卷，在元代史学占有重要地位。这部典志通史以完整的体例、详密的材料和进步的史学思想，从典制沿革的角度，全面总结了宋以前的历史。元朝历时不久，但却很注意典章制度史的总结。由虞集主编的《经世大典》880卷是元代官修最大的典志体史书，大典以会要的形式，记载了蒙古时期的历史和社会制度，反映了元初至文宗朝的典章制度沿革，其规模与内容之宏富，可与宋代各朝会要相比。元英宗时纂集的《元典章》分前集、新集，前60卷，记元世祖至延祐七年（1320年）英宗初政时各项典章制度；新集不分卷，记元初迄至治二年（1322年）年典制，似为补充而未竟之作。前后二集分类不尽相同，内容所录为元廷所颁诏令、律令和有关事例，是法令典制文书的汇编，已与会要体史书以事类为门、叙述典制和有关史实的体例有所不同。《元典章》的会典性质是从会要发展而来的，其体例为后世《明会典》和《清会典》所仿效。《元典章》虽然编次杂瑣、条理不清，但它保留了元代法令条文大批原始材料，在《经世大典》散佚的情况下，此书便成为研究元代各种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元官修法典文书汇编还有完成于至治三

年的《大元通制》，它具有民法法典的性质，分制诏、条格、断例、别类等四项，共 88 卷，全书今已不传，现存的《通制条格》22 卷为原书条格项的大部分内容。此外，又有官修的《宪台通纪》正续集、《南台备要》，以及由王士点、商企翁私修的《秘书监志》。前两者所记御史台制度，书已失传，仅存《永乐大典》辑本；后者保存完整，全书 11 卷，对有元一代秘书监的建置迁除、典章故实、职官题名皆有详细记载。

其三，元代别史、传记、史注等历史著作得以发展。元代史家在补、注《资治通鉴》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胡三省所作《通鉴音注》294 卷是一部传世佳作，堪称《通鉴》功臣。胡注的工程极其艰巨，《通鉴》本身部帙浩繁，有 300 余万字之多，而胡注的字数则接近于正文。其所涉及的范围极广，举凡《通鉴》记述的赋税、职官、舆服、刑法、天文、历法、乐律、地理等典章制度和有关名物，都详加音训注释，并指出原文或其他注文的谬误，尤其是官制、地理两项，考证更为精密。胡三省还在注文中阐发自己的史学观点和见识，对史实、史法作出评论，并借注释表露他忧国忧民、反对民族压迫的思想。对于《通鉴》的补作、续作则有元初金履祥的《通鉴前编》18 卷和元末陈桢的《通鉴续编》24 卷。金氏书采《诗》、《书》、《礼》、《春秋》及诸子旧史，详加训释，对三代史事考订颇多；叙事上起唐尧，下接《通鉴》，补写了周威烈王以前史事，故号为前编。陈桢书第一卷述盘古至高辛，意在补金书所未备；第二卷采契丹在唐、五代事迹，以记辽国之兴；其余

22卷皆记宋辽金三朝历史；其书仿朱熹《通鉴纲目》之纲目体，并在三朝史事的编排上强分正朔，但有关辽、宋的史料较多，可资利用。元代还有一批研究《通鉴纲目》书法的著作，意在“夷夏之辨”，多不关乎史实，故不为后世所重。

苏天爵的《国朝名臣事略》是元代杰出的传记体史书，取当世文献记当代名臣名士，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对旧史改造，是史家根据自己的思想和观点重新组织材料、形成新著的一种重要手段。元初郝经的《续后汉书》90卷，就是对陈寿《三国志》的改造，在王朝统绪上，变刘蜀为正统，以曹魏在闰位；其可取之处，在因《三国志》无志书，特立疆理、职官、食货等八录为志，具有编纂学上的意义。此外，又有一批别史杂记。如王鹗《汝南遗事》、刘敏中《平宋录》记元灭金灭宋史迹；权衡《庚申外史》记顺帝朝36年大事，刘佶《北巡私记》述元末兵败、顺帝北逃情形。元代历史笔记的内容也很丰富，其中以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最为突出，全书30卷，记事585条，所记以元代典章制度、历史掌故、元末农民起义为多，其次对于典籍、书画、戏曲、诗文也多有考证评论。又如《山居新语》、《研北杂志》、《农田余话》、《至正直记》等笔记，对元代社会生活、文化、朝野轶闻都有大量记载；《乐郊私语》、《草木子》则对元末历史有诸多反映，可资利用。以上史著，所记多为当朝史事人物，由此也可看出元代史家对当代史撰述的旨趣。

其四，元代地志和行纪的成就大大超过前代。元代的

方志在前代基础上取得较大进展，官修地理总志《元一统志》初修本为 755 卷，增修本达到 1300 卷，它综合了唐宋总志的体例，分建置沿革、坊郭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势、古迹、宦迹、人物、仙释等门类，比之前代总志，体例更为齐备，从而完成了全国性地理总志的定规，并为明清一统志所承袭。《元一统志》已佚，现存仅有赵万里的辑本 10 卷。除官修的一统志外，私家撰写的全国性总志还有虞应龙的《统同志》、萧魁的《九州志》、郝衡的《舆地要览》、滕宾的《万邦一览集》、朱思本的《九域志》、佚名的《元混一方舆胜览》等<sup>①</sup>。这些总志多已散佚，仅有后两者的元刻残本传世。元疆域辽阔，纂修方志的范围比前代大得多，据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统计，元修方志约 160 种，数量超过了宋代。现存元修方志的全本或辑本仍有 14 种，从其记载内容、体例和方志理论上看，都比前代有较大的进步。元代方志比宋代方志较少浮华的文人情调，而更注重纪实，保存了大批原始的风俗记录和经济档案，这对明清两代方志重掌故纪实的风尚有所影响。元代方志学对方志的性质、功用、渊源、编撰方法等问题，提出了不少新见解，他们在方志编撰的实践中，总结出许多宝贵的经验，其中如张铉的《至正金陵新志修志本末》凡例九条，则是现存最早的修志准则。蒙元的行纪著述也很丰富，《长春真人西游记》、《西游录》、《北使记》、《真腊风土记》、《岛夷志略》都是世界闻名的重要行纪，对于反映中外交通历史，对于研究 13、14 世纪的亚洲文明和世界文

<sup>①</sup> 见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中华书局，北京，1962。

明史都有重要作用。

史学思想是史学的灵魂。元代史学的诸多成就除以上所述外，最重要的还是元代的史学思想顺应时代的要求，有了显著的进步和发展。自忽必烈建元以后，元朝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一定的史学思想总是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在史学领域的反映，因此，认识元代史学思想的发展应该结合元代社会的进程来考察。

### （一）元代前期，主要指忽必烈时期

这一阶段是社会巨变、社会矛盾发展和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时期。元世祖忽必烈在其先辈西征扩土，灭夏、灭金的基础上锐意进取，于中统元年（1260年）登大汗位，至元八年（1271年）定国号为元，建立元朝。5年后元兵攻占南宋首都临安，至元十六年（1279年）消灭南宋，统一了全国。与此同时，以忽必烈为首的元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建设国家机器和巩固统治的措施。一方面，忽必烈意识到蒙古以武力得天下，“武功迭兴，文治多缺”<sup>①</sup>的问题，并早在即汗位前受命治理漠南汉地时，接受了儒家学说的观点，任用了各族儒生。建国以后，为了适应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基础，他采取了一些“变易旧章”的文治措施，同时为笼络汉族地主阶级，利用汉族儒臣来协助新朝立朝仪、制典章，也实行了若干有利儒士的政策。但是另一方面，作为蒙古贵族的总代表，忽必烈又不能不照顾为蒙古贵族的利益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在

<sup>①</sup> 《元史·世祖本纪一》。

元朝初年，北方和江南的汉族儒士则经历了“天崩地陷”的巨变，他们不仅有亡国的痛楚，又因蒙元统一战争的杀掠和民族歧视政策的压迫，饱受身心的双重苦难。

社会巨变必然引起意识形态领域产生多种反映，因而元初的史学思想领域是多姿多彩的。首先是如何对待元朝统治和民族关系的各种思潮。元初史学家胡三省在他的史学力著《通鉴音注》中，便通过论说史事申斥元朝横暴统治，表达故国情思，“充分表现了民族气节和爱国热情”<sup>①</sup>。这种正当的反对民族压迫的思想，在金履祥的《通鉴前编》中也有所流露。反映民族不满情绪的另一方面，是元初一批学者通过研讨朱熹的《通鉴纲目》，倡揭朱熹的“正统”理论和“夷夏之辨”思想，意在为南宋争正统，这是从消极的方面表露对异族统治的不满。与江南士大夫新近亡国的“切肤之痛”相比，北方汉儒因长期生活于少数民族政权统治地区，使他们能以比较务实的态度看待民族关系问题；另外，金亡四十余年，他们目睹蒙元统一大业的进程，又受到忽必烈等一些蒙古统治者好儒崇礼的影响，思想已有了较大转变。于是，郝经提出了“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的思想，走与元廷合作的道路。同样承认元朝统治的北方大儒许衡则为元廷总结“行汉法”的历史经验。以郝经、许衡为代表的思想家和史学家，通过考察历史而提出的正确主张，为化解民族矛盾、促进民族合作发挥了作用，反映了元代民族史观的进步。另外，杨奂的《正统八例总序》和修端的《辩辽金宋正统》也在史学的“正统”之辨

<sup>①</sup> 陈垣：《通鉴胡注表微·后记》。